

# 冯玉祥离豫赴京原因探析

陈景柱

1922 年 4 月 29 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大幕正式拉开。冯玉祥因肃清后方郑州有功，5 月 10 日，由陕西督军调任河南督军。在河南不到半年，此后又于 10 月 31 日由河南督军调任北京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及其部队也就由河南开封转至北京南苑。北京作为当时国家的政治枢纽，历来为各方要人所重视，冯玉祥此次离豫赴京，为他触及中央政权进而影响民国政局创造了条件，日后发生的两次北京政变即是明证。因此，可以说冯玉祥离开河南进入政治中心的北京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笔者不揣粗浅，拟从地方和中央两个方面加以探析。

## 豫省内部军人倾轧

四战之区的河南，经历直奉战争之后，政治、军事资源又重新洗牌，前督军赵倜去位之后，冯玉祥接任豫督，并驻节开封。而助冯驱赵有功的靳云鹏、胡景翼则盘踞在郑州、彰德一带。加上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坐镇洛阳，冯玉祥豫豫可谓名不符实。

### （一）靳、胡对冯玉祥的不满

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之后，河南督军赵倜窥伺郑州防务单薄，又听信吴佩孚战死的谣言，遂趁机会捣乱后方，冯玉祥以及第八旅靳云鹏为冯督督介弟赵杰的宏威军及归德镇守使第二师师长宝德全所攻击，由于事发突然，又属暗袭，冯部与靳部几至不支，所幸陕西督编第一师师长胡景翼率部自洛阳赶来援救，始把围攻的敌部击溃，赵倜不得不弃开封而走他处。此次郑州战役之后，冯玉祥接任河南督军，进驻开封，靳云鹏由于此前担任郑州城防司令，因此，第八旅之兵也就驻扎在郑州一带。胡景翼则被任命为京汉铁路线的护路使，率其第一师移驻彰德一带。由于郑州之战的胜利完全是冯玉祥、靳云鹏与胡景翼共同御敌的结果，但反观战后的利益分配，冯玉祥得以督豫，而靳云鹏、胡景翼则几无收获。

胡景翼在此次郑州之战中的功劳可谓最大，在冯玉祥、靳云鹏几乎招架不住的时候，胡景翼及时增调部队上前迎击，郑州之战始得转机，就连冯玉祥本人也称赞胡景翼这次战役出力很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冯玉祥虽然称赞胡景翼出力大，但他仍然认为他们平素缺乏训练，处处脱不掉所谓乡气。

在战后查抄赵倜私产时，从赵所开设的军装局里，抄出约值 20 万元的铜元，当时有人建议把这些铜元分给各友军，冯却主张这是赵倜取之河南的钱，应当用之于河南，不应随便分散，乃将这笔款项拨作平民教育。这件事情在现在看来，冯将赵倜私产拨作教育经费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当时以兵为生的军阀们怎么能相信冯玉祥的部队没有私吞赵倜的私产，就连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都认为冯将没收来的赵倜财产，“定都是发给了官

兵，若不然，官兵心里一定不平。”冯玉祥的好友吴稚晖都这样认为，足见当时的靳云鹏、胡景翼心中所想。且据陶菊隐记载：“冯因分配军饷问题与靳云鹏、胡景翼不和，河南有张（福来）、靳、胡倒冯的风传。”因此，可见靳、胡在利益分配上的确是对冯心存不满的，而且欲联合倒冯。

对于这些风传，冯玉祥也十分清楚，并且有所防范。直奉战争后的河南，多年受政治及天时的影响素来多匪，再加上河南民情强悍，这次赵倜败退，部队溃散，尤多流为土匪。当时报载“当鲁山被围之初，连电请救，不发一兵，绅民不得已推代表四人，往见军民两长，跪地大哭，冯亦相向作楚囚之泣，谓之日，我对不住你们，无兵可拨云云，实则十一人聚集省垣，以与靳、胡之意甚深，不敢遣兵他往，留以自卫。”由此可见一斑。

### （二）吴佩孚对冯玉祥的排挤

在冯玉祥督豫初期，吴佩孚已经登上了直鲁豫巡阅使的宝座，驻洛阳，掌握直系兵力，冯部也受其节制，但是冯千方百计要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直奉战争时期，吴佩孚曾抽调冯部李鸣钟旅参加对奉战争，事后拟将该旅扩充为师，调防保定，以削弱冯的军事实力，冯急忙调回该旅以免被分割。因此，冯与吴意见不合，大致是由河南开始而逐渐尖锐起来。

在河南地方人事任免上，吴佩孚与冯玉祥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直奉战争后，吴佩孚仍保举宝德全为河南军务帮办，推其原因，一方面，宝德全与曹锟、吴佩孚有旧，吴佩孚任命宝德全为河南军务帮办实际上有对冯玉祥掣肘的用意。冯玉祥认为宝德全帮同赵倜，依附奉贼，残杀其将士死有余辜，因此，命其手枪队长李向寅把宝德全拉到车站旁边的高粱地里枪毙了。

在冯枪毙宝德全不久，吴佩孚又电冯推荐车庆云为冯的参谋长并介绍了许多人分担重要职务，除秘书长以外，均一一指派了人，而冯对吴所介绍的人，一律予以挡驾，从此吴冯关系更趋恶化。更有甚者，吴佩孚又让冯玉祥替他在河南筹措 80 万元的款子，并且以后要每月经常划拨 20 万元，对于这个强横的命令，冯连思索也没有，马上复电说无此搜刮压榨的本领，不能遵办。你如果要钱，那就请你来当河南督军好了。吴佩孚虽近在洛阳，竟不能过问豫省之事，一向骄横自大的吴巡阅使，对此岂能忍受，自此事之后，吴佩孚便竭力排冯，非夺取河南地盘不可。

## 北京政府之援引

中国经历了数千年封建制度的熏陶，专

制思想不可避免地会体现于民初的政治之中。因此，民初的官僚政客们往往将政见不同的异己者视为仇敌，大有不较出高低死不休之势，并且争相培植势力以相抗衡，这就给了那些具有军事实力但无政治势力的军人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而冯玉祥此次去豫赴京就与此有关。

### （一）保派与洛派斗争的促成

直奉战争之后，在中央，国家政权为直系单独掌控，但直系内部却暗藏裂痕。由于曹锟、吴佩孚分别以直鲁豫巡阅使与副使的名义驻节于保定和洛阳，因此曹、吴身边人的政治集结又被称为“保派”与“洛派”。直系内部的矛盾分歧自奉系失败、黎元洪复位后便已开始，首先在于对所谓“最高问题”的态度上，吴佩孚认为应先实现全国统一，再图总统之事。但曹锟则急于取代黎元洪登上总统宝座。

其次，在罗文干签订奥款展期合同一事上，吴佩孚得到了利益，曹锟却分文未得。因此，保派军人王承斌打密电叫各直系省军网做曹锟的后盾，必须一致通电痛击罗文干，如果吴佩孚敢包庇罗，就加以卖国之罪，只以吴佩孚一人入狱。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把吴佩孚的威风打下来，另一方面，借以打击黎，以便把曹锟早日扶上总统的宝座。

从上述两事足可窥见直系内部的裂痕因为政见相异而愈演愈深。直奉战争后，北京一带，按照约定，奉、直双方均不驻兵，而“近虽南北苑有第九师等填驻，非夙负重望者，且非纯系直系，一旦有事，未足可恃。”基于直奉战争后的形势以及“与洛派”斗争的需要，“保派”成员亟需一支强有力的军队驻守在京城，以保证其计划的实现。因此，保派成员鼓动曹锟促成冯玉祥的入京。

### （二）府方与直系斗争之需要

不光直系内部存在着矛盾，府方与直系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当直系假借恢复法统之名，顺带请黎元洪复任大总统，本意不过当其为可操纵的傀儡，但黎元洪禁不得左右一班攀龙附凤的政客们怂恿，他自己也未免有几分久蕴思起的热情，随即答应复任总统。复任总统之后，他不愿受人摆布，因此也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与直系方面抗衡。

黎元洪复位之后，总统权限即屡遭掣肘，在许多大政方针上都与直系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其中斗争的焦点实为内阁问题。1922 年 8 月 5 日，黎元洪为了争取到南方的支持与同情，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但唐绍仪深知直系即中央，不敢北上就任总理。嗣由教育总长王宠惠代理，1922 年 9 月 19 日，王宠惠改代署，然其成绩，亦不过奉承军阀指挥，策划直系军饷，任命武人省长而已。后以惟吴佩孚之命是听，为“保派”所不满，乃假手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以财政总长罗文干受贿案，逼令王宠惠提出辞呈，时为 1922 年 11 月 29 日。

冯玉祥去豫赴京的时间为 1922 年 10 月 31 日，由上可知，在此时期国务总理实为王宠

惠，但王宠惠却倾心与吴佩孚接纳，枢府政务皆由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主持，而孙、高二人均系吴佩孚之心腹。因此，黎元洪深感威胁，设法摆脱直系控制。而此时王宠惠内阁中的陆军总长张绍曾为恢复法统奔走有力之人，在黎元洪复位出了不少力气，黎、张二人又都参加过革命，与北洋系相异，关系也较为亲近。因此黎元洪拉拢张绍曾以对抗把持枢府的孙丹林、高恩洪等“洛派”人物，并且企图促成冯玉祥的部队入京以壮声势。

关于冯玉祥的入京，曹、吴均无异议，但对冯的部队问题，吴佩孚极力扼杀，曹锟的态度虽无从考稽，但可以得到证实的是，冯玉祥部队的军饷问题，曹、吴并未为冯解决。而这个事件就为府方黎元洪的介入创造了机会。根据冯之所言，其部队在京的军饷问题曹、吴并未为他解决，吴佩孚曾经答应每月仍由河南援助 20 万元也成为一句空话。但此时恰逢黎元洪与直系因内阁等问题产生矛盾，而总统黎元洪、陆军总长张绍曾均无实力，所以，很想把冯调到自己身边，作为政治资本。因此基于保、洛所请，黎元洪也顺水推舟，于 1922 年 11 月 1 日发布大总统令，“特派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除此之外，黎元洪与陆军总长张绍曾还设法解决了冯玉祥部队进驻北京的难题。首先，将冯玉祥的部队改编为一师三个混成旅，部队有了名义，款项就不难设法。接着，由政府指定按崇文门关税的全部税收和京绥铁路的部分收入，作为冯部一师三旅的军费。为此，冯玉祥极为感谢张绍曾，但殊不知没有黎元洪的同意，崇文门的税收与京绥铁路的收入怎么能轻易划为冯部的款项呢。此外，黎元洪还通过与张绍曾的关系视察冯玉祥的部队，并集合全体官兵发表过讲话，试图拉近与冯的距离。

但从冯玉祥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黎对冯的拉拢并不奏效。而且冯玉祥对于黎元洪帮助并无太多好感，认为“黎总统是个圆滑的角色，他怎肯平白为我们出力？”最后反倒是黎元洪在冯玉祥等人的逼迫下，不久便丢了大总统的宝座。

冯玉祥离豫之后，直系内部矛盾为人所关注，冯、吴矛盾也已公开化。冯玉祥此次的调职，实受各方因素裹挟，换言之，其由豫赴京并非完全出自其本意。但对于冯玉祥本人来说，此次调职，虽然失去了河南省的地盘，但部队得到正式扩编，款项也有了着落，从此，冯部得以从事休整、训练、培养干部，为后来发动北京政变创造了条件。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8 月 21 至 22 日，由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安徽史学》编辑部和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暨“不列颠图书馆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研讨会在合肥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河南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有近 50 位学者与会。会议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不列颠图书馆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课题架构，从传播视域探讨文献研究的新路径。以下从“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基本理论问题探讨”“各种类型文献的分析、考订与解读”“报刊传媒与历史文献研究”三个方面对此次会议作一述评。

## 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基本理论问题探讨

文献本身价值的界定及确立等属于史学工作者的探索范畴。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国内学界早有涉及，但从传播层面解读文献，探讨文献及其社会意义呈现等关联有其新意。安徽大学王天根教授认为，文献研究要关注内容，而从传播的角度将内容和载体结合起来，考察文献与传播网络、文献与博物馆语境中时间、空间以及文献与文献关联的时代性、民族性等关系意味着继续拓展的空间。传播视域中的文献意味着史料本身就有“媒介”的性质，复旦黄旦教授认为历史涉及图像和文本的关系。史学对于史料的选用，其立足点在于历史“真实”，也就是该史料对于揭示某一历史事件所具有的重要程度。由此构成区分史料的等级。就此而言，史料蕴含着当时的人和历史的关联。从媒介的角度来说，“六经”皆媒介，而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其特定的意图视野、体制制度、运作方式和性质功能，互为纠结但又区分。史料作为一种媒介，本身属一种连接，把不同的空间连接起来，也将不同的时间联系起来，形成社会网络，形成了时间的延续性。由此而论，史料是历史的基础，史料媒介学是史料的基础；历史研究需要史料，但更需要史料媒介学。

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涉及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交叉。南京大学李良玉教授认为，文献传播研究属文献学、传播学和历史学三个学科领域的共同关注点；考量文献传播首先要注

其基本形态，从古典时代的器物传播到印刷时代的小众传播，再到近代媒体的大众传播，以及当下网络时代的多层面传播，传播形式多样使文献形态及传播方式与媒介技术同步发展。就文献传播的特点而言，李良玉区分信息生产与文献生产之不同，文献是从海量的生活信息中淘出来的，生活中的信息是生活化的，研究中文信息却是学术化的。苏州大学社会科学院朱从兵教授对文献传播的历史进程亦作探讨，指出文献传播大概经历铭刻文献、简帛文献、写本文献、刻本文献及网络文献传播的阶段。文献传播本身的历史应当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传播延续了文化的生命力，而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文献传播实现的。

# 从传播视域探讨文献研究的新路径

——第二届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述评

## 各种类型文献的分析、考订与解读

史学研究聚焦的主题不同，其文献类型亦有别。传播视域下文献研究须关注各种类型文献的历史特性。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郭常英教授着眼于近代慈善义演文献的研究，通过民间、社会与政府等不同视角对相关文献类型作深入考察，对近代慈善义演文献与传播有关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她认为近代募捐义演珍稀文献的民间传播，主要通过民间收藏与展示，以及社会机构的收藏与展示两个方面来体现。而限于研究领域的专向化与社会关注度的局部化，相当部分文献无法顺利流通于社会。

史料之所以珍贵，在于其稀缺性。安徽大学王天根教授报告了他在不列颠图书馆发掘珍稀文献的过程，并详细介绍了这些文献的类型、特点及意义。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高俊聪运用不列颠图书馆藏晚清重臣鹿传霖四封信函，探讨鹿传霖的治学及为官之道、人际网络，展现了蒋琦龄、刘熙载、钟骏声、陈际云的成就、思想追求、价值观、生活状况等，有助于深层剖析相关历史人物的思想及晚清士人社会网络。档案文献的重要性向来为历史研究者所重视。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介绍了他收集和整理有

关“小三线”建设的政府和企业档案近况，以及这些档案的开发和利用在推进小学科发展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只有在尽可能完整收集利用相关档案的基础上，同时辅与其他各类史料，才能开展对“小三线”建设的严谨的科学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刘祥学教授以明清时期岭南地区的长寿文献为研究对象，对岭南地区长寿文献的形成、流传及其原因等进行深入分析，刘祥学认为，这些文献的形成与传播反映了地方士绅的乡土观念。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朱晓凯教授以晚清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外交家薛福成的日记为研究对象，力图展示薛福成与近代国民政府和民间举行的一系列“七七”纪念活动进行系统的分析，通过《中央日报》对纪念活动的动态报道等方面，分析了抗战时期报刊对“七七”纪念活动的聚焦及舆论动员，从而呈现了报刊记载历史文献的价值。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方慧琪分析《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后，中共在国统区的舆论阵地《新华日报》在“舆论建构、议程设置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呈现中共宣传策略的转变并考察其转变背后复杂的政治纠葛。”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张敏、王茜茜以《新华日报》与《解放日报》为文献，探讨了《新华社报》与《解放日报》有关“七七事变”纪念报道中标题与正文有关蒋介石称谓的使用次数与变迁，从而讨论抗战时期中共党报在“七七事变”周年纪念中的话语转向，皆从报刊文献的角度阐释中国近代报刊与文献传播的关系。报刊文献记载了历史的方方面面，尤其各类大报小报，其刊载内容丰富，量大面广，在文献传播方面其作用不可忽视。这也需要专家学者在此后的工作中重视报刊文献的整理与使用。

## 报刊传媒与历史文献研究

文献所承载的内容具有再现历史的作用。文献通过传播从而发挥其社会功能，实现由潜在的价值向现实价值的转变。但文献传播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报刊等近代传媒作为文献及其传播的载体，对于特定历史事件研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历史语境内报刊作为一种文献载体，“在通外外、通上下、通中西中发挥民众动员和社会启蒙作用。”天津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杨莲霞对《北洋官报》的副产品及其稿件来源、发行状况等，有助于深层剖析相关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晚清士人社会网络。档案文献的重要性向来为历史研究者所重视。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介绍了他收集和整理有

学历史系曹曦对日据前期台湾教育中的“殖民现代性”作了初步的探讨，作者以《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为主要文献，探讨日据前期台湾民众在文化领域的殖民现代性的表现、日本殖民者是如何通过报纸这种传播工具传播自己的理念以及台湾民众具有怎样的反馈等问题。

文献在过去常作为史料使用，其内容关联人物的变迁，报刊文献本身具有传媒的特征。福建师范大学曹丹以历史事件“徐州突围”为切入点，解析“共时性传播”和“历时性传播”的互动关联，从文献传播与历史记忆的角度发现其文献中的一些隐喻和意义，达到再现历史真相的作用。合肥学院郭静以《中央日报》作为文献载体，就抗战期间关于国民政府和民间举行的一系列“七七”纪念活动进行系统的分析，通过《中央日报》对纪念活动的动态报道等方面，分析了抗战时期报刊对“七七”纪念活动的聚焦及舆论动员，从而呈现了报刊记载历史文献的价值。

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方慧琪分析《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后，中共在国统区的舆论阵地《新华日报》在“舆论建构、议程设置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呈现中共宣传策略的转变并考察其转变背后复杂的政治纠葛。”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张敏、王茜茜以《新华日报》与《解放日报》为文献，探讨了《新华社报》与《解放日报》有关“七七事变”纪念报道中标题与正文有关蒋介石称谓的使用次数与变迁，从而讨论抗战时期中共党报在“七七事变”周年纪念中的话语转向，皆从报刊文献的角度阐释中国近代报刊与文献传播的关系。报刊文献记载了历史的方方面面，尤其各类大报小报，其刊载内容丰富，量大面广，在文献传播方面其作用不可忽视。这也需要专家学者在此后的工作中重视报刊文献的整理与使用。

总之，传播视域下的历史文献研究，不仅关注文献所反映的具体内容，且着力揭示文献的流传过程及其社会网络等。文献是承载历史文化的媒介，文献意义的发掘及其解读关乎研究者与历史真相隔空对话的可能。从文献研究到文献传播的探索，研究者应具历史学、文献学、传播学等跨学科视野，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对相关问题做多维度的解读。（郭静、张敏、王茜茜、严悦整理）

文史周刊

主编：赵岩 编辑：陈晓燕  
电话：010-65257746  
E-mail: wenshichanglang3@163.com

## 晚清筹赈义演的兴起及其意义

朱许在《史学月刊》2018 年第 8 期发表《晚清筹赈义演的兴起及其意义》一文，文章指出：义演在中国成为一项较为重要的公益活动，最初主要是借助于晚清时期新型义演活动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的产物。义演在逐步成为义演活动的重要募捐手段的同时，其自身也发生了许多具有新兴意味的变化，其中交织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等各种因素的碰撞，呈现出复线发展的结构。筹赈义演的这种发展历程和面貌，一方面显著体现了义演社会化救灾的发展面相，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义演活动日渐适应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需要。

## 梁启超归国与民初政争

高翔宇在《清华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发表《梁启超归国与民初政争》一文，文章指出：梁启超结束海外流亡生涯得以回国乃得益于民初政争形势的转变。梁氏归国初期的 20 余天里，在他周围，袁世凯、共和党、民主党、国民党激进派、稳健派等各方势力纷纷出场并展开了角逐与博弈。基于利益方面的考量，梁启超与各方派系的关系，既体现了沟通与合作的一面，同时充满了矛盾与斗争。值得注意和思索的是，透过梁启超前后所关联的史事，不仅再现了走进共和之际梁思想历程的变迁，而且可以隐约预见民初政争政治的若干走向。

## 清季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

《史学集刊》2018 年第 4 期发表李航的《浅析清季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文章指出：作为历史教育的主要工具，历史教科书在清季开始登上教育和学术舞台。当时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清朝历史的叙述，大体是基于“本朝史”的书写框架；进入民国后，历史教科书的根本内容虽然短时期内未做大的变动，但基于民国的共和立场书写清朝历史则成为教科书编者的共识。本文从书写原则、书写策略等方面，以及民族、国家认同等视角，对晚清民初之时历史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进行分析，以期对历史学如何求真与致用，提供一个典型案例。

## 二十世纪前期白银汇率的两次异常震荡

杜物诚在《历史研究》2018 年第 3 期发表《二十世纪前期白银汇率的两次异常震荡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文，文章指出：19 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国家采用金本位货币制度，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金贵银贱呈现为一种长期的变动趋势。近代中国是一个以银铜为金属货币的国家，白银汇率曾出现过两次异常震荡，一次出现在 1919—1921 年间，一次出现在 1930—1935 年间。这两次白银汇率震荡是西方国家向外转嫁危机的结果，对中国经济造成深重的负面影响。在这两次危机中，中国经济遭受的损失是环环相扣的和整体性的。面对白银汇率引发的危机，中国完全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缺乏及时应对和化解危机的财政货币手段及经济政策措施。

## 《国风》与春秋时期的北方地域文化

颜世安在《历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发表《〈国风〉与春秋时期的北方地域文化》一文，文章指出：《诗经》十五《国风》的地域文化特点是一个古老话题，也是现代《诗经》研究中的热点。但迄今为止的《国风》地域文化研究，始终未能涉及它与底层民间风俗的关系问题。同《楚辞》相比，《国风》显示出文化风格的一致性。这一对比常被理解为，楚地风尚独特，人民信鬼好巫；北方则若一整体，民风质朴。十五《国风》跨越从今陕西到山东的许多地区，各地不可能没有各自不同的民间风俗和宗教信仰，但这些特点没有在《国风》中得到表现。究其原因，盖与北方封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具言之，北方封国注重宗法，语言雅驯，排拒地方怪力乱神。《国风》曾走出庙堂，歌咏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仍延续雅言文化的这一传统。

## 明清江南的内河航运网络及其公共场域

陈宝良在《史学集刊》2018 年第 5 期发表《夜航船：明清江南的内河航运网络及其公共场域》一文，文章指出：作为一种客货兼运的内河航运工具，夜航船的出现应该在宋代。在元代，夜航船已成为江南颇为普及的交通工具。至明清两代，航船、夜航船达到了极盛。航船不但有日行或日夜兼行之别，而且有固定的线路，形成了江南独特的水乡航运网络。明清江南航船线路，大抵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省内航线，二是跨省航线。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夜航船是人们交流信息的重要场所，堪称一处流动的公共场域。清末民初以来，汽船、汽车开始出现，加之内河火轮的广泛使用，显然对传统的航船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最终导致航船业逐渐趋于衰落。